

林光铨

《星报》、古友轩创办人

LIM KONG CHUAN

生卒年不详

林光铨，字衡南，生卒年不详。林光铨是新加坡文化界、报业及出版业先驱，可惜记载关于其生平的文献少之又少，除了知道他曾于1890年创办本地的第二份华文日报《星报》外，关于林光铨的事迹，学界所知甚少。

从林光铨古文（如其所撰之《浯江孚济庙碑记》）造诣之深观之，他应当是在金门出生和在家乡受过传统的书院教育，念过四书五经，其文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三字经》、《千字文》的启蒙教育。

2000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一册）里收录了一本由古友轩于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的《西河林氏族谱》，这部《西河林氏族谱》藏于北图，过去不曾被本地学界所知道。族谱的“后记”中记载了林光铨自述的一小段生平事迹如下：

…咸丰末年（约1861）客游新嘉坡，每见英人精印摹写之法、字画如新，宛然秀劲，虽日书数千言，倚马可待。心慕彼技精巧，遂往求学，仅几阅月，尽传其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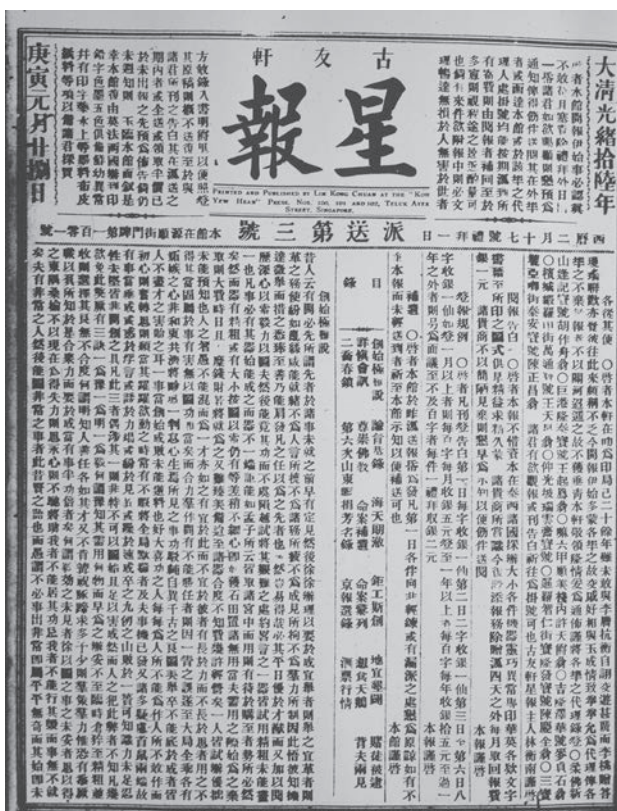
清楚地表述了他于咸丰末年（约1861年）从金门

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本地看到西洋人精湛的印刷技术，从而在本地拜师学艺。可以推测林光铨原本早已对印刷术有所认识，才会在短时间内学会西方的石印技术。令人动容的是林光铨在“后记”中还说道：

…铨也、他日袖一部归之浯江，藏之堂庙，使向之父老、求而弗获者，今且全璧皆珍向之。

这表明林光铨希望带着自己出版的族谱，他日衣锦荣归。衣锦还乡确是当时离乡背井的华人的最终目的，所不同的是，林光铨并非以身怀家财万贯返乡为目的，而是身怀精湛的印刷之术返乡。在《西河林氏族谱》一书的后记中他还以“浯江裔孙林光铨”自称。过去学界曾经对林衡南与林光铨是否为同一人，持不同看法。主要是古友轩与《星报》皆以Lim Kong Chuan之名注册。但从《西河林氏族谱》的记述，我们可以证明林光铨与林衡南为同一人。

林光铨南来之后，在九八行大本营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称源顺街）创立了著名的古友轩印务馆，起初设在门牌52号，后来业务扩张，遂迁到101号及102号。古友轩的业务蒸蒸日上，很快成



《星報》。

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印务馆。

一家由华人经营的印务馆要在异乡承印中文刊物或许并不太难，难的是承印与自身母语之外的语文刊物。古友轩就承担了这项赋有融入本土社会及异地文化交流双重意义的出版任务。1880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Strait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委托古友轩承印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97-1840年）的自传《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古友轩所刊印的《阿都拉自传》，全书为爪威文（Jawi），只是在封底有一则中文广告曰：“本轩承印各款文字，细心校对，依期告竣，惟冀光顾者请认招牌，庶免致误。”

林光铨的苦心并没白费，这部石印版的《阿都拉自传》之付梓，当时获得本土马来社会的赞赏，当年的马来报章赞扬古友轩承印的这部传记印刷精美，皇家亚洲学会也付出高达400银元的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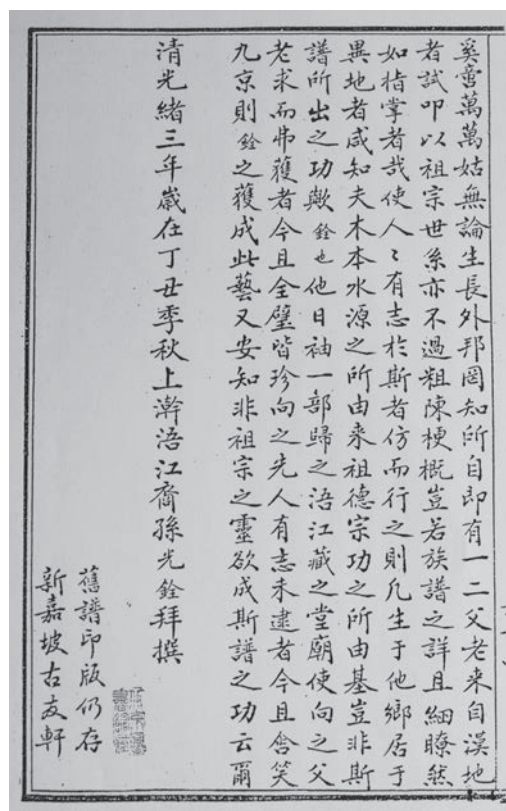
林光铨鉴于新加坡为南洋通商大埠，华人众多，而马来语（巫语）则是和外族沟通的共同语，所以他自南来后就勤学马来语。为了协助同胞在这华洋杂处的新加坡谋生，他编一册名为《通夷新语》的马来语入门工具书，于1877年以石印印刷由古友轩出版，将马来字汇分类以漳泉及潮州方言注音。出版后，销路很好成为畅销书。六年后，他请李清辉修订《通夷新语》，易名《华夷通语》于1883年，仍旧由古友轩印刷出版。新版的《华夷通语》由清朝驻新加坡第二任领事左秉隆作序。古友轩能请到左秉隆为其新出版的书本作序，说明在推动本地文化事业上古友轩地位非凡。左秉隆在叻担任领事期间，大力推动本土文教事业，其中创办了文社——会贤社及会吟社。林光铨是这两个文社的重要推动者。

除了马来语工具书，古友轩在1886年时曾出版一本汕头语工具书——“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本书没有华文书名，目前学界翻译为《汕头话读本》，全书168页），作者为海峡殖民地法庭的通译员（Interpreter）林雄成，林雄成在书中自称潮州林雄成，当是潮州籍。这是一本专供洋人学习汕头话及华人学习英文而编撰的语言工具书。此外海峡殖民地政府还曾授权予古友轩，将海峡殖民地宪报（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翻译成中文出版流通。

1897年，海峡侨生林文庆与宋鸿祥（宋旺相）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又名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推动海峡华人的文教事业。这是一本双语刊物，内容环绕提倡华语和儒学、改革本土社会及教育。《海峡华人杂志》每年出版四期，从1897年开始，共出版了11期，其中第一年的四期是由古友轩所承印的。



《浯江孚济庙碑记》。



林光铨《西河林氏族谱》。

古友轩1877年还出版了一本有关族谱的书——林光铨校勘《西河林氏族谱》，图文并茂一册。这本书鲜有人提及。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按原文繁体加以影印，收录在《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并注明是“据清光绪三年新加坡古友轩石印本影印”。

林光铨还是19世纪著名报人。他于1890年2月14日创办《星报》，由古友轩印行，是本地第二家华文日报。虽然《星报》的创刊比《叻报》稍迟，然古友轩本

身的创办年代却比《叻报》早。另外与《叻报》创办人薛有礼不同的是，林光铨是初来乍到的新客，薛有礼则是来自落户马六甲及新加坡已经三代的土生华人世家。

《星报》馆址设在直落亚逸街101号古友轩印务馆内。《星报》创刊之初，首四天免费派送，以后每月报资一元。我们已经无从洞悉林光铨办报的原始动机，188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人口约为10万，根据《海峡殖民地的蓝皮书》的记录，这时期《星报》的发行

量比《叻报》还要高。以1896年为例,《星报》的销售量为970份,《叻报》却只有500份。从《星报》所刊登的广告中我们得知,《星报》的除了本地,还曾外销到南洋各地,例如马来半岛的柔佛、马六甲、吉隆坡、檳城,暹罗(泰国)、仰光(缅甸首都)、三宝壟(Samarang印尼爪哇)、井里汶(Cirebon印尼爪哇)、巨港(Palembang印尼苏门答腊)等地都有代理。

《星报》的创办年代正值晚清,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在海外办报的林光铨,其办报思想自然是关注国家的命运,支持康有为领导的尊孔运动,痛恨列强、希望通过改革振兴国势。此外《星报》也同时关注本土华社的动向,呼吁改革时弊,推动文教事业。这时《星报》的主笔是来自广东番禺的萧庆祺。

《星报》除了星期天及假日,每天出版八版,第一版是社论,新闻报道刊登在第二及第五版,其他包括广告,报社告白及外地报刊新闻摘录。从《星报》上广告所占有的版位来看,广告收入应是古友轩收入的重要来源。古友轩不单办报,承印出版物与各种单据,而且还兼卖由中国进口的各类书刊、文化用品,甚至代售皮帽、水烟筒等物品。

除了印务事业,林光铨也积极参与浯江孚济庙的创建。光绪丙子年(1876年)旅居新加坡的金门人发起在牛车水史密斯街(Smith Street,旧译士敏街,俗称戏院街)成立浯江孚济庙(金门会馆前身),为金门同乡提供宗教祭祀的场所,以及为旅居南洋各地的同乡提供一个联系互助的机构。建庙的《浯江孚济庙碑记》就出自林衡南之手。他是孚济庙的创办人之一,被选为董事,他捐款两百元充建庙基金。庙内供奉开拓金门的圣侯恩主陈渊夫妇,福德正神,以及祖先禄位。林光铨在《浯江孚济庙碑记》中写道“如是

则神人共庆,民物咸宁,诸事安祥,既措施之悉协,一堂亲睦。实休戚以相关,法良意美”。

林光铨何时逝世暂不清楚。《星报》维持九年后至1898年杪停刊。不久,林文庆与其岳父黄乃棠利用《星报》印刷所古友轩的设备创办《日新报》。

《星报》停刊原因众说纷纭,极可能与林光铨去世有关。林光铨和《星报》极端支持康有为的尊孔运动,应该也同情康有为的改革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邱菽园和林文庆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1899年10月22日)发电报致请愿书给清廷要求解除光绪帝的软禁,各界知名人士都纷纷签名,史称“星洲上书记”。但是,林光铨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星洲上书记》内。1898年10月7日,《叻报》上刊登一则拍卖古友轩印刷馆的广告。查阅隔年《叻报》,还有一则相类的拍卖启事,惟在内容中增加“已故林光铨”字样。这些间接证据意味着林光铨逝世于1898-1899年间。

参考资料:

1. 《星报》
2. 《日新报》
3. 林光铨,《西河林氏族谱》,新加坡:新嘉坡古友轩,1877年
4.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
5. 陈蒙鹤、胡兴荣,《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
6.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